

系书
关丛
美究
中研
汪熙主编

14



本书讲述一个美国人的传奇故事，
他由美国白宫推荐给蒋做顾问，
却不能正式代表美国政府，他
是蒋介石的政治顾问，却对中共
和周恩来深有好感……

「日」矶野富士子 整理

吴心伯 译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大学出版社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中美关系研究丛书

汪 熙 主编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日〕 矶野富士子 整理

吴心伯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

——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

〔日〕矶野富士子 整理

吴心伯 译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40 000

版 次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1—1 1000

书 号 ISBN7-309-01602-5/K·55

定 价 16.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欧文·拉铁摩尔先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其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出生在美国,童年却在中国生活,后又去欧洲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然而他的最终兴趣在中国,他在中国北方的边疆地区进行充满艰险的旅行和研究,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到了抗战时期的延安,后又接受罗斯福总统的提名,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由此作为学者的他与抗战时期国共双方及美国高层人士有许多接触,了解三方人士(尤其是蒋介石方面)的不少想法,以及当时一些重要决策的背景,本书即是当时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的真实和生动反映。

Publication of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eries Studies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eries Editor: Wang Xi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Chiang Kai-shek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Compiled by Fujiko Isono
Translated by Xinbo Wu

Fudan University Press

50 Tseng Chia Ngai,
Nov. 22, 1941.

Dear Mr. Latimore,

Thank you for the privilege you granted to two of the members of our newspaper, the New China Daily, by an interview. I myself would like to call you, if you would permit. Would Monday the twenty-fourth ni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be convenient to you if I call at that time? Please do not bother to answer if you consider it suitable. Many thanks.

Sincerely yours,



Chou En-lai

Mr. Latimore,
3 Pan Shan Hsing Oh'un,
Chungking.

周恩来致拉铁摩尔函
(1941年11月22日)

Dear Mrs. Cattimare,

I shall be
deeply grateful if you would
kindly mail the enclosed
skins in America for me.

With many thanks.

Yours sincerely,
Song Shing Ling

Jan. 12. 1942

宋庆龄致拉铁摩尔函

1942年1月12日

Dear Mr. Williams: I've just received a cable dated from L.A.

Could be informing me that he would be sending an answer
to me in writing I don't send please newspapers, I am glad
that he has finally come

He will then,
they by Long Beach
2 August, 1941.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便用箋

宋美齡致拉铁摩尔函

1941年8月2日

主 编 前 言

1990年我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手稿部查阅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资料。在同管理员的交谈中,得悉拉铁摩尔档案刚移交给该馆。这是我久已向往的材料。经我说明来意后,国会图书馆的主事非常合作,同意在拉的档案尚未分类编目的情况下,根据我的需要调出一部分先看起来。这使我很感动。因为在国内,这是绝不可能的。没有编目就让你看,而且是手稿,没门!

经过两个多月的梳爬,我终于找到了拉铁摩尔口述回忆录。这正是我要寻觅的东西。全部文稿藏于第四盒,都是白纸打印稿。有的文句断断续续,不太完整,有的标题已修改了好多次。这显然是一部口述记录,经过拉铁摩尔过目修改后的文稿。我请国会图书馆复印部复印了其中的171页,预备带回国,仔细研究,如有出版价值,便将与国会图书馆商量版权问题。接着我又到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州杜鲁门总统图书馆,补充一些与拉铁摩尔有关的材料。半年后到西海岸加州大学(柏克里)开会,一位美籍日本学者告诉我,拉铁摩尔回忆录已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仓促间在柏克里预订了一本。1990年底回国后,好一阵才收到新书。这是矶野富士子女士在与拉铁摩尔长期合作中,整理拉氏口述回忆录的定稿本。这本子同我自国会图书馆带回的手稿本对照,除第一、二章是新增补的以外,其余基本是一样的,不过文字经过润色,篇章衔接得更紧密,读起来头绪更清楚一些。在与矶野富士子女士和东京大学出版社联系后解决了版权问题。随即请吴心伯博士翻译。基本译毕后,吴心伯博士赴美研究。有些扫尾部分,又请刘永涛博士补译完毕。

在成书时,我把在国会图书馆和杜鲁门图书馆收集到的较有

价值的有关材料作为附录收入本书(见本书目录)。此外,我又把国会图书馆拉铁摩尔回忆录手稿所著录的,但在矶野富士子写的书中阙如的,用同页脚注方式补入本书。上述附录及脚注都是在矶野富士子女士原书之外补加的。这一部分如有差错,由我负责,特此声明。

以上是出书的经过。

拉铁摩尔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虽生在华盛顿首府,但1岁就随父母到中国,在中国的北方度过了他的童年。12岁到英国读中学。19岁再回到中国,在天津等地的洋行谋生。25岁结婚。从26岁起,就开始他研究和考察中亚地域的漫长学术生涯。拉铁摩尔研究工作的特点是亲历其境,实地考察当地的风土人情、疆域变化和发掘考古。他多年的岁月是在塞北荒漠中度过的。除英语外,他精通汉语、蒙古语和俄语。拉铁摩尔的一本一本著作令地理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们深感震惊,被奉为是这一领域的权威成果。30年代到40年代初拉铁摩尔除仍致力于中亚研究外,又受聘兼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辑。《太平洋事务》在当时是一本研究太平洋问题的很有影响的杂志。到1941年,他应罗斯福总统之召,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时,拉铁摩尔已经是一位关于中亚地域研究的著作等身、享有盛誉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研究太平洋事务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他的一生中,拉铁摩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他自1900年在襁褓中离开美国,直到1928年才重新踏上故国的土地。用他自己的一句话说:“28岁才第一次看到美国。”以后的十年,他的足迹仍遍历中国和中亚各地。长期的海外生活与工作的经历,造就了拉铁摩尔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洞察力。

拉铁摩尔本质上是一个学者,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读书人。不会搞勾心斗角政治的那一套。40年代末50年代初,新中国的建立,对美国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冲击,使很多美国人晕头转向,上上下下

都有一种深沉的失落感，探索追究是谁把中国搞丢了，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在这样的动荡中，各色人物都跳出来了。参议员麦卡锡认为这是他大捞政治资本的好机会，撑起了打击“非美”活动的大旗，到处抓“特务”、“内奸”、“不忠分子”。搞得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拉铁摩尔作为一个毫无强大政治势力保护的学者，是“可以轻而易举击倒的牺牲品”，因而，不幸成为麦卡锡主要的猎捕对象。没完没了的听证会，数不尽的罗织的罪名，写不完的交代……大有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势头。拉铁摩尔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讲过或写过的东西，一再被摘引出来，完全脱离了原来的上下文”，“一些曾以为是朋友的人，都完全销声匿迹，还有一些人，提供对我不利的证词。”（按：即揭发批判）。在写回忆录时，拉铁摩尔很宽容地说，事隔多年，他已不计较这些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不能离开他自己当时生活的环境和模式。但有一个人他忘不了。他就是有名的号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此人是凭借拉铁摩尔的学术声誉在美国发迹的。魏氏原为德国共产党员，1933年被捕脱党，1935年来华，结识了拉铁摩尔。在麦卡锡时期，魏特夫一口咬定拉铁摩尔是一个秘密的共产党员。拉氏回忆说，30年代在中国时，魏特夫就开始贴近拉氏夫妇并不时怂恿拉铁摩尔在他的出版物中多引用魏特夫自己的作品，借以提高身价。当时，拉夫人觉得味道不对头，曾警告拉铁摩尔说：“此人正在拍你的马屁，以便在美国发迹。他是这样一种人，要么舔你的靴子，要么用他的靴子踹你。”在麦卡锡风头正健的时期，也许魏特夫认为他用靴子踹人的时刻到了，于是把拉铁摩尔狠踹了一阵。当然，在美国政府和国会的猎捕中，也确实制造了一些闹剧。联邦调查局曾窃听拉铁摩尔同一位蒙古朋友用蒙古语交谈的电话。但该局找不到懂蒙古语的人来“破译”窃听的内容。于是转请局外人推荐。这位局外人不知里情，推荐了拉铁摩尔。于是，就成了拉铁摩尔来“破译”自己被窃听的电话。在四面楚歌，到处都出现“反戈一击”的情况下，拉铁摩

尔的处境十分险恶。据他自己回忆，“当时虽没有死刑的危险，但有长期蹲监牢的危险”。经过好几年的折腾，后来虽以“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被搞“臭”了的拉铁摩尔，没有人敢随便接近他，也没有哪个单位敢聘用他。在63岁那年，拉氏不得不离开故国，亡命海外，寄寓在他度过青年时代的英国。等到85岁再回到美国时，已经是垂暮老人了。1989年5月30日拉铁摩尔逝世于美国的罗得岛。

在拉铁摩尔的思想中，有一个闪光的珍品，即美国历史学者柯文教授在他的名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所提出的“移情”(empathy)概念。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把感情转移过来“设身处地”地去想。拉铁摩尔回忆，他19岁时在中国即开始“把我的中国同事作为我们，而不是作为他们来考虑”。(按重点号是原书就有的)。这是一个思想感情上的大转变，也是一个思想认识上的大飞跃。他不再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白人领地俯视中国事物和人。拉铁摩尔批评一些美国人说，“我们的同胞们表现得特别幼稚和褊狭”，“存在着一种美国式的过分简单化的倾向。”拉铁摩尔回忆说，当时“对我的主要指控是我应对美国丢失中国负责”。拉氏反问道：“你怎么能失去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呢？”这真是一言中的的好反问。谁曾册封过美国人可以“拥有”中国呢？美国人有什么资格“丢失”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呢？这种“幼稚”、“褊狭”(再加上一个“狂妄”吧)支配着有些美国人的头脑(不幸的是也支配着一些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的头脑)，不止一次地把美国导向歧途。拉铁摩尔的悲剧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汪 熙

1996年3月于复旦校园

前 言

每当人们问他：“你为什么^不写自传呢？”欧文·拉铁摩尔就会回答说：“噢！我还没有那么老。”然而不幸的是，岁月比他所预见的流逝得更快。当他最终决定要记下其漫长而丰富的一生时，发现自己难以把涌上心头的往事回忆组织成有条理的章节。

那时他住在英国剑桥。像他非常喜爱的游牧民一样，拉铁摩尔甚至在1970年从利兹大学退休之后还乔迁了好多次。他和妻子埃莉诺(Eleanor)曾计划回到美国，定居在地设计的一座新居里，但她在1970年3月突然去世。因此，在弗吉尼亚呆了大约一年之后，他搬到巴黎，这样到利兹去要方便一些，他在那里好不容易才在退休前两年开设了一门研究蒙古的研究生课程。然而1980年他最终决定再回到英国。

鉴于他不能撰写自己的整个自传，我便建议他集中记述他替蒋介石工作的那个时期，由于他几乎没有写过有关他与总司令相处的文章，人们想知道拉铁摩尔何以被罗斯福总统选中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以及他在重庆究竟做了些什么。

虽然他没有采纳我建议的标题——“我与蒋介石”——因为听起来很像一段音乐，但是这个主意使他感到高兴，他开始起草一份回忆录，并取名为“替蒋介石工作”。他从自己怎样出乎意料地接到白宫打来的电话写起。写作一开始很顺利，但写了五、六页后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这时我建议，如果我向他提出问题并录下他的回答，或许他就比较容易整理自己的回忆。时值1982年春天。我从70年代初就

开始同欧文一道工作，但完全是在蒙古研究的领域内。我对中国现代史的了解有限。但是没有专家经常来采访他，连续数小时被采访对他来说是太疲劳了。我别无选择，只有自己承担起这份工作，并间或得到一些汉学家朋友的帮助。

一开始我试图拟出整本书的大纲，并按计划提出问题。但是很难恪守规则。有些问题是根据专家们的建议而设计的，但我很快发现，欧文对这些问题中涉及的事件和人物的详情所记甚少。他主要谈论他个人的经历。他完全凭记忆回答问题，不作任何准备，只是偶尔查阅一下记录或文件。

我决定让他随便谈，他常常离题，讲述许多题外的故事。结果这些题外话比直接的回答更富有启发性，更引人入胜。我曾长期与他共事，因此可以向他提出一些鲁莽的问题，诸如“作为享有特权的白人社会的成员，你生活在受剥削的中国人中间是否感到不自在？”或者“当蒋介石发现你并非他想要的那种顾问时，他是否感到失望？”

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一致认为，读者必须了解在他的背景中，是什么使他为罗斯福选中。于是我们追溯到他的出生，甚至更远地回溯到他的父母。关于他的早年的叙述是如此的冗长而丰富，以致于我建议“我与蒋介石”可以改成他的《中国回忆录》。这样原本作为倒叙的那部分后来便成为眼下这本书的第一、二章。

在大约两年时间里，我们录下了三十多个小时的采访记录。录音是断断续续进行的，有大量的重复。在采访中，每当他想起与谈话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交谈便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

然后录音带必须整理成文字，支离破碎的资料必须通过拼板玩具式的过程整理得井然有序。我努力进行这一工作，这只是因为毕竟我晓得他在谈些什么。除了插进一些连接词并把同一个故事的不同说法合并到一块外，我忠实地保存了他的原话。除此之外，我还利用了他以前与某些来访的汉学家的谈话。在这种情况下，我

更多地采用他早先的说法,除非有其他证据表明后来的叙述是正确的,因为他年岁较轻时记忆力更准确。

虽然整个初稿到1984年便完成了,但欧文的健康不允许他进行修改。我不得不请求约翰·迪弗兰西斯(John De-Francis)教授编辑这份稿子,迪弗兰西斯是汉语专家,是欧文以前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现已从夏威夷大学退休,他友好地接受了这份差使。

1985年秋,欧文回到美国,住在离他儿子戴维不远的罗得艾兰州波塔基特(Pawtucket, Rhode Island)。在那里他的健康有了惊人的好转。当我1986年9月去看他时,在我和他相处的两周内,他完全能够修改前面五章。凭着恢复的记忆,他加进了一些段落,并删去了某些他认为过分口语化的句子。

虽然他显得活泼而风趣,但他每次在写字台旁坐不到一个小时。我离开那里时,最后两章仍没有动。欧文说他将修改这两章并寄给在日本的我。事实上,我并不真正指望他能完成这项工作,而无需他的“监工”——他过去常常这样称呼我——坐在他的身边。但是,他看来如此精神,工作起来思路又如此清晰,因此我对将剩下的两章留到我第二年来看望他时很是乐观。

不幸的是,1987年初夏,欧文中风了,这使他丧失了说话和写作的能力,但是他继续阅读他喜爱的周刊,甚至包括一些严肃的著作,并且似乎理解其内容。尽管有极大的不便,但他依然很快活,这多亏他的女管家艾玛(Emma)的悉心照料。他的情况使我们希望他能再一次康复,再干些事情。一年之后,虽然他保持了健康的外表,但他的讲话表明病情几乎没有什么好转。这样别无选择,只有执行出版计划。

然而意外幸运的是,欧文在1944年参加华莱士使团(Wallace Mission)期间草草记下来的旅行笔记在他的文件中被找到了。由于这些文件记录了他访问重庆的详细经过,包括同蒋介石和蒋夫

人的谈话——这些欧文都不大记得了——于是我决定将该笔记的某些重要段落加入第六章的初稿。同样幸运的是，匹茨堡大学的罗伯特·纽曼(Robert P. Newman)教授——他即将出版有详细文献根据的拉铁摩尔传记——非常热诚地审阅了书稿，指出了事实和日期上的疏漏混淆之处。

由于这本书既非拉铁摩尔亲自撰写，也不是他本人口授的，因此那些读过他的著作的人将欣赏不到他独特的写作风格。我想强调指出，这些回忆录不打算成为准确的历史资料的来源。但是我努力纠正显而易见的错误，并辨认出欧文已忘记其名的那些人。本书是叙述拉铁摩尔记得什么以及是怎样记住这些事情的。指望谁能马上想起四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件的详情，这是不现实的。同样必须承认的是，欧文活跃的想像力有时使故事比实际发生的更加生动形象。

本书主要通过对时代背景的回忆而不是以事实的精确性来促进人们对历史的了解。例如，它逼真地再现了统一战线内国共两党势力的相互作用。由于国共双方对这一时期保持沉默，统一战线对美国战争努力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意义现在有时被忘却了。

有些读者会把他的叙述看成是继续驳斥麦卡锡时期对他亲共的指控。当然欧文可能会无意中——如果不是有意的话——觉得必须再一次表明自己的立场。也可能欧文的这种公众形象反映了在麦卡锡时期塑造的形象。

文中的中国地名多少是按照传统拼法。为了便于辨别人名，我依据《民国传记辞典》(4卷本，1967—1971年，布尔曼和霍华德编)的拼法。

我要感谢所有那些帮助出版拉铁摩尔回忆录的人，他们人数众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尤其要感谢入江昭教授，他很早就鼓励我并积极推荐出版；感谢弘次小林教授和昌英澆沢教授，通过他们的协助从“大同生命基金会”和“庆增澆沢回忆录基金”中获得了出

版津贴。我要感谢东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嵯来,他们提供了编辑和其他业务上的帮助,还要感谢欧文的另一个老朋友艾丽丝·索纳(Alice Thorner),她和约翰·迪弗兰西斯一道帮我撰写了这篇前言。我感谢纽曼教授替我弄到这些照片。

欧文·拉铁摩尔于1989年5月30日去世,当时这本书的稿子正在出版社的考虑之中。他把自己所有的藏书都遗赠给剑桥大学的蒙古和中亚研究所。该所主任卡罗琳·汉弗莱博士(Dr. Caroline Humphrey)是首批参加利兹大学蒙古研究课程的三个学生之一,欧文相信他的事业将在那里得到继承和发展。

矶野富士子